

新的一年 国人有哪些期盼

春节临近,每个中国人都期望着吉利、幸福、平安、昌盛。在这遥望大地回春、万物重生的节日前夕,我对今年的期望其实非常简单,概括起来就是“三无”。哪“三无”?即:一“无”由于各种复杂原因导致的大规模战争;二“无”特大自然灾害;三“无”人为造成的特大事故。这三“无”的心愿是一种祈福和祈祷,它是对中国的祝愿,也是对世界的期盼。

把不希望发生战争算做第一盼,是因为今天战争的阴影正在美国和伊朗的上空聚集。美国近日协同欧盟表示对伊朗实行石油制裁,既不买原油也不买制成品,力图卡住伊朗经济的主动脉。如果以这种“逼和做法”造成的危险局势不能尽早刹车,擦枪走火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

伊朗当然也不会示弱。无论是巴列维时期还是霍梅尼时代以及今天,恢复大波斯帝国的光荣,重建伊斯兰世界的荣耀,始终是伊朗人梦寐以求的意愿。如此一来,美伊如果开打,势必将演化为西方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灾难性大冲突的开始,接着便是全球能源大危机的开端。石油对外依赖度达到50%以上的中国,其经济发展也将遭池鱼之殃。如果经济能源紧张受到重创,不但中国老百姓的日子不好过,就是多年来受益于中国的东北亚、东南亚各国也会出现负面的连锁反应,形势会变得发

发可危。2012年,为了世界也为了自身,中国必须以和平使者的身份在国际冲突中更加积极地担当调解者的责任与义务。

把有效应对自然灾害风险算做第二盼,是因为几年来发生在中国本土和邻国的自然灾害频发,让多少生灵死灭。去年的日本大地震、泰国水灾、东非大饥荒……不仅使这些国家和地区遭到巨大的财产损失,而且暴露出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对于自然环境的巨大破坏作用。事实一次又一次证明,人类对物质生活无节制的追求,以及为了满足这种追求而对地球各类资源无穷无尽的开采,是导致自然灾害频仍的主要原因。这是大自然愤怒的报复,也是对人类曾经企图“改造与征服”大自然的强烈嘲讽和无言抗议。

处在高速发展时期的中国,已经出现环境问题。最近中国环保部宣布将把PM2.5纳入监测指标,这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与“民间环保主义”的共同胜利。令人忧虑的是,对地球生态环境和生物链的破坏至今还没有引起更广泛人群足够的重视。中国东部地区(特别是“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地区)因地下水的过度使用所造成的地面沉降仍然在逐年加剧,人们对地震断裂带的科学认识还远远达不到进行科学预测的程度。这些,都不能不令人感到担心。尽管如此,预防自然灾害的“药方”其实还

是有的,那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就是中国数千年来,我们睿智的祖先所揭示的真理:天人合一。

把在新的不再发生特大人为事故算做第三盼,是因为无论是矿难、列车出轨、校车倾覆还是其他的人为事故都让我们看到了那么多的命悬一线,听到了那么多无辜百姓和孩子的呻吟与哭声。人们痛感到利益链条的残酷无情,更认识到社会管理意识的薄弱和制度性缺失,是走向现代国家必须跨越的关隘。法治、道德、监管、责任,是正常社会的四大支柱,是把人的物质财富欲望约束于合理范围之内的先决条件和根本基础。没有它们作为屏障,任何欲望横流,让追逐个人利益的冲动变成脱缰之马,那么一切都会脱轨,最终的结果只能是社会的混乱和繁荣的消失。回顾中国30多年来改革开放走过的历程,人们在权衡得失利弊中会越来越懂得:清贫当然不是社会主义,仅有物质的富足也不是社会主义,只有富足与文明的共存共生才是人民与国家的福祉。

愿望是主观的,现实是客观的。在很多情况下,客观的现实难以改变。但是,中国有句老话曰“事在人为”。如果连愿望都没有,世界还会进步吗?白云哭于山巅,祝福起于新年,让我们从2012年的春天起,就为一个和谐与美好的世界努力吧。不要辜负这新的一年!

白云乡

回家过年不是『文化苦旅』

民政部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对北京、上海、广州等六大城市的人群进行过年回家的调查,探寻很多人不愿回家或是不想回家过年的原因。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有近70%的受访者表示“为春节回家而烦恼”,烦恼集中在车票、人情消费压力、路途遥远等客观因素上(1月15日《北京晨报》)。

虽说春节的主题是亲人团聚、亲情交融,但在亲情至上、孝字当先的传统文化熏陶之下,春节从某个角度来说已逐渐变异为“礼数节”,诸如长辈礼数、朋友礼数、同事礼数、乡情礼数,以及着眼于现实利益纠葛的“公关礼数”等。因此,人们“为春节回家而烦恼”,实际上是在选择逃避。

经济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主义文化的大行其道,是造成人们“为春节回家而烦恼”的主要原因之一,而消费文化背后的“面子文化”,恐怕是一个重要动因。除此之外,传统的礼数对大众行为的潜在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必须看到,某些经久不衰的陈旧陋习,一旦搭上了泛物质化、货币化的便车,就很难让人们再淡泊与理智下去了,面子、形象与“感情搭售”、礼数公关,宛如是自我膨胀的文化气球,在节日的天空中负重挣扎,于是本应是主宰礼数、礼仪文化的人们,反倒成其奴役了。可见,人们“为春节回家而烦恼”,实际上也是一种减压的方式。

我们中的许多人之所以沦为消费“节奴”,文化“节奴”,可能恰恰是因为那些本应纯净、淳朴、雅趣的民俗、节仪、文化母语,被庸俗而功利的现实俘获和“奴化”了。

春节这一世界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一定要万分珍视。春节作为中华民族的重要人文传统,将伴随我们永远走下去,如何延续好这一传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如何过好春节,如何更文明更轻松地过春节,更是值得我们好好思考的问题。我们不但应该考虑怎样摒弃春节传统中包含的不适合现代人们生活现状的成分,更应该考虑如何避免当下很多陋习污染春节这一美好的传统。只有保持文明节俭的光荣传统,春节才能一年比一年更轻松,一年比一年更人性化;回家过年,才会成为快乐和文明的一次回归,而不是一次“文化苦旅”。

张西流

靠什么凝聚改革信心

据报道,经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中央级公费医疗计划明年纳入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体系。此前,北京已完成各区县以及市级公务员的公费医疗改革,涉及约33万人的中央级公费医疗成为下一步改革目标,北京市相关部门今年将启动方案设计工作,明年启动正式启动改革。

曾有报道说,自1998年启动公费医疗改革以来,全国已有90%左右的省份将公费医疗制度并轨基本医疗保险。如果确实如此,中央级公费医疗改革则明显滞后。这显示出医疗改革在行政级别方面的渐进性,级别越低的改得越早,在全国是地方级往往先于中央级,在地方是县区往往先于市级。在所涉人群方面,改革同样显示出渐进性,很长时间里,中国医保呈现出一种二元格局,公务人员享受公费医疗,其他社会成员则参与社会医保。

中央级公费医疗怎么改,现在还不十分清楚。从北京市的公费医疗改革来看,公费医疗人员并入职工医保后,还可以享受财政补贴,这是其他人无从享受的。也就是说,即便公费医疗并入职工医保,公务人员仍受到特殊对待,公平性成为问题。

公费医疗改革,可以看做是中国改革进程的一个缩影。渐进性是中国改革的突出特征,空间上是先局部试点后全国推广,选择上是先易后难。难易如何判定呢?从医疗改革这一社会领域改革来看,公务员群体的改革,显然被认为难于其他社会成员的改革,或者说,难易程度的判定,某种程度上与改革对象与权力的距离成正比对应关系。公务人员以及社会事业领域的精英分子,离权力更近,社会影响力更大,掌握更多社会资源,因此涉及他们的改革,往往阻力更大。

中国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推进更加艰难,一个很大原因,就是改革作为利益调整,已经指向权力群体自身的利益,权力自身的改革问题已经无可回避。这方面的改革进展缓慢,动力不足,由此引起的社会不公问题也被诟病已久。

目前,地方改革步伐普遍放缓。经济领域由下至上的改革推进,曾构成改革最初的图景,而当改革涉及权力自身,在中国现行政治结构下,地方基层推进改革的空间和资源其实已经不多,需要由上至下进行,权力级别越高越要起到表率作用。从公费医疗改革一例来看,中央级公费医疗几成“最后堡垒”,令人担忧。

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要继续靠渐进式改革而不是靠其他方式,仍然是中国社会的主流共识。必须通过大力推进改革,来维护改革声誉,凝聚改革信心,增进改革动力。一方面,政治改革、经济改革、社会改革和文化改革,作为改革的重要内容,各自推进到了什么程度,相互关系如何,应有更加清醒的认识。另一方面,那些事关权力自身的改革,尤其需要取得更明显的进展。刘敏

『弹性退休制』如何体现公平

据介绍,全国妇联、人社部等国家有关部委正在调研弹性退休制。不是简单地一刀切,而是让男女在退休年龄上有选择权。北京市人大代表、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所长谭琳称,相比较此前颇受关注和争议的“妇女延迟退休”,这一制度更具合理性,也更能体现男女平等。(据1月15日《扬子晚报》)

实行“弹性退休制”的提法已有多,虽然方案各不相同,但都引起了诸多争议。不过,争议目的是为了回避只有少数人获益,多数人受损的局面,而是希望所有人都能公平享受到改革所带来的利益。因此,推行“弹性退休制”的前提,就是要确保公平优先,实现政策普惠的局面。

此次全国妇联、人社部所调研的“弹性退休制”,乃是设立一个退休年龄区间界限,让男女都可以根据自身情况来选择,而非只针对某一群体。这种方案不分性别,摒弃了原先的“延迟女性退休年龄”提案,而是面对所有男女劳动者,在退休年龄界限上实现统一,相比之下更具合理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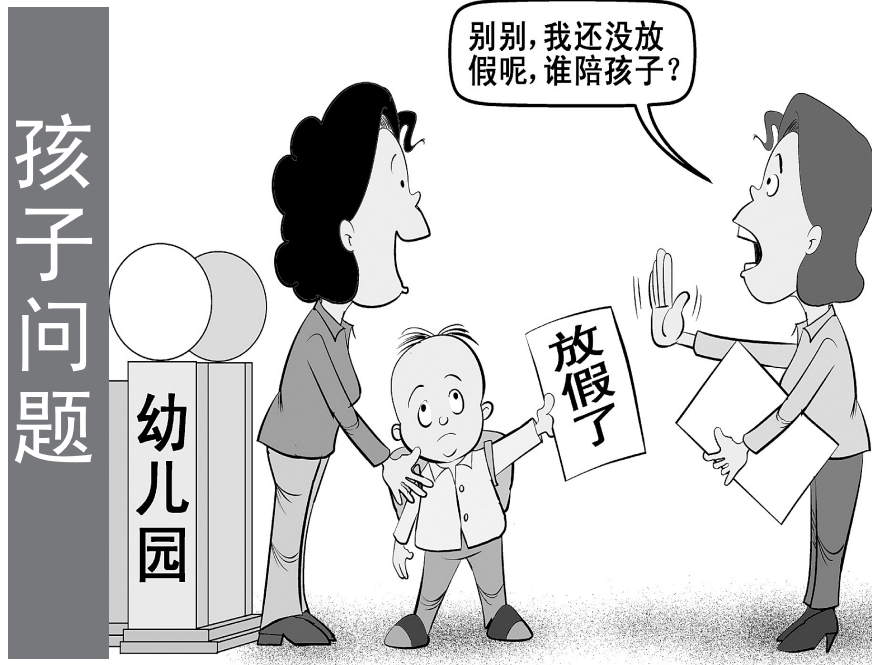
不过,根据这种方案,虽然男女都可以自己选择退休年龄,但由于身份、职业等不同,不同的人退休后可获得的利益可能差别较大。因此“弹性退休制”如何体现公平公正,是一个绕不过的话题。

目前相关退休养老保障制度不够完善,各阶层、地区均不统一,差异化过大,呈现碎片化状态。公务员、事业单位、国企、民企等不同群体,其本身工资福利待遇就不同,所缴纳养老保险费用和享受利益也不尽相同,可谓是天壤之别。如果让劳动者自主选择退休年龄,公务员、事业单位、国企的职员就会因利益而要求延迟退休。

而且,我国贫富差距过大,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干部与普通公务员、企业高管与普通职工、垄断国企与其他企业等之间的收入状况悬殊。如果不先把收入沟壑填平,又怎能实现公平退休。如果将退休选择权交给劳动者,必然造成“马太效应”,加大收入差距。

由此可见,在当前各种因素不太成熟的情况下,实施“弹性退休”如何确保公平公正,如何照顾不同身份、不同职业者的利益,这应是政策着重考虑的问题。“弹性退休制”可以探索,可以讨论,但一定要尊重所有劳动者的意见,特别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

江德斌



目前,很多幼儿园的宝宝们开始享受放寒假的乐趣,但是爸爸妈妈们还没放假,谁来带宝宝呢?为了照顾放假在家的孩子,许多家庭都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有的父母请钟点工照料孩子,有的从乡下接来了年迈的父母,等等。保姆和老人看孩子,给孩子安排的主要活动也就是看电视、玩玩具,生活无规律。这样,使得相当一部分孩子在长假中养成了睡懒觉的坏习惯。幼儿园能否不放寒假?家长提出这样的疑问。对于幼儿园老师的安排,家长也说,如果不放假,老师很辛苦,可以请园方安排轮休,或给予加班工资补贴。 焦海洋/图

春节恐归族背后的“伪道德规则”

春节临近,是否回家过年又让“恐归族”开始纠结。民政部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对北京、上海、广州等六大城市的人群进行过年回家的调查,探寻很多人不愿回家或是不想回家过年的原因。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有近70%的受访者表示“为春节回家而烦恼”,烦恼集中在车票、人情消费压力、路途遥远等客观因素上。(《北京晨报》1月15日)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春节团圆是传统民俗——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却有越来越多人害怕回家过年。一言以蔽之,因为春节回家过年开销太大,已经成为一种沉重的经济负担。来回的路费,父母亲人的礼物,走亲访友的花销,晚辈的压岁钱以及同学朋友的饭局应酬……这些算下来,还真不是一个小数目。对于月收入不高的工薪族来说,“恐归”说到底就是一种无奈的辛酸。

不过,站在“父母”的角度出

发,很多年轻人的各种“恐归”理由,不仅没有必要也站不住脚。有不少人感慨而善意地提醒“恐归族”,父母其实并不在意孩子是否“衣锦还乡”,或者给他们丰厚礼物,而是全家团聚。幸福最重要,其他都是浮云——这话很在理,也很诚恳。可是谁家的父母不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风风光光地回家过年,而又有几个在外打拼的游子不想给年老的父母献上一点孝心呢?常年不在父母身边尽孝,假如春节还要空手而归,恐怕大多数人在感情上也难逃自我的“拷问”。

有人认为,春节回家主要是孝敬父母,其他方面的开支可以尽量减免;还有人表示,过年的意义更多在于家人团聚而不是送礼送礼,应该少一些不必要的应酬,多陪陪父母家人。请恕我直言,“理论上”是这样,但现实却不允许我们“纸上谈兵”。

礼尚往来是中华民族一直沿

袭下来的风俗习惯。然而,蕴含着人与人之间真挚感情的礼尚往来,却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着某些变异——不以礼金或礼物作为“敲门砖”,无论是“客人”还是“主人”,都会觉得不自在。不管我们承认还是不承认,传统社交方式已经变得越来越形式化和功利化了。春节走亲访友,亦是如此。

在现代文明的视野下,恐怕没有人会否认——过于功利形式主义的“礼金式祝福”已经从民俗沦为一种陋习。然而,值得警惕的是,在这种陋习风中,几乎所有人都戴着道德的面具,沉溺在道德的幻觉中——走亲访友不送点礼金和礼物,不但社会不认可,本人也无法心安理得。久而久之,当伪道德成为潜规则化的、通行的道德准则,“害怕回家过年”就成为越来越强大的“伪道德规则”辐射下的必然。在某种意义上说,这同打着“纸上学”的幌子,让人无法回避的精神通胀。

王艳

善待摆摊老人是践行好的价值观

如能将心比心,人就会对生活产生新的领悟。就会对老人生出一份尊重,并使人与人之间多一些宽容和理解。

“寒冷刺骨的冬天,街上不少占路经营者都是老人,都是七八十岁的年纪,作为一名城管执法人员,内心也很纠结:为什么快过年了,他们还在外面忍受着刺骨的寒风?”发此微博的是青岛市北区城管执法局即墨路中队的小王。(1月13日《城市信报》)

“我们命该遇到这样的时代。”这是莎士比亚作品《辛白林》中的一句话。在这个转型时代的社会里,人们很焦虑,内心也很纠结。不用说,人生存不易,而小商小贩的生存则更为艰难。“谁愿意出来摆摊,我要不摆摊吃什么。”小商小贩之艰辛,也是民生之艰辛;小商小贩之哀痛,亦是民生之哀痛。

先不说大道理,先不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样的先人之语。从日常生活说,每一个人都是依存他人而存在,在生活中需要有多重角色的转换,在此地是强者,在彼地可能就是弱者。因而,应有这样的省思:理解了他,就是理解了自己。想让别人善待自己,就要用同样的方法先去善待他人。

小商小贩的生活关乎你我他。小商小贩在给众人的生活带来方便的同时,还使城市的文化个性和灵性具体化。小商小贩是激活城市生活的动力,而不是麻烦制造者。在这个世界上,哪里都有小商小贩,城市生活离不开他们的吆喝,他们的活力。收藏家马未都谈到美国的小商小贩时曾说,小贩卡洛洛斯不幸心肌梗塞猝死,引发了许多人对他的哀思和自相的哀思,连《华盛顿邮报》这样的大报都在头版刊登了他的哀闻和故事,于是人们自发地前去寄托哀思,表达了对他的尊重。一个没有远大理想和抱负的人,只愿意踏踏实实做自己的小事,目的甚至可能仅是赖以生存,但社会给了他无尚的荣誉,而且真实不造作。他不需要成为英雄,公众也不需要他变成神而不再是普通的人,他只需要体现他的价值即可,而这一点正是我们今天社会所欠缺的。

将心比心,人人只要不是只想着自己而不为他人考虑,他人才会为人人考虑。好的体制容易促使更多的好人产生,但即便是在设计有缺陷的体制下,也会有好人存在,这是人性的力量使然。无论在何种境况下,人们都应怀有善心善愿,因为善心善愿是一种品行,一种精神力量,还是一种生活智慧及对社会的洞察能力。无论在何种境况下,人们都应做一个好人,践行个人所认为的好人的价值观。

“我们执法的时候真的很为难,处罚不近人情,但是如果让他们继续留在那儿摆摊却是我们的失职。”这是小王的一段微薄语,表达的是体制问题所造成的两难窘境。人人好是社会好的前提。作为一个城市管理者,应想一想,大冷天摆摊的老人,如果是自己的亲人会如何对待他。这不是别的什么问题,是关系到是否良知泯灭的问题,是人性所关切的重要人生问题,是执法者每一天都要面对都要扪心自问的问题。伊文

迁移环境灾害是以邻为壑思维

尽管公众已对连接不断的环境污染产生了“审美疲劳”,但迁往老少边穷地区的污染企业所带来的环境灾难还是让人惊悚。

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1月9日对内蒙古托克托“污水湖”污染事件的报道,石药集团中润(内蒙古)公司等企业排放的污水,沿着黄河灌溉污染了流经的多个村庄,水量之大以至于离奇地形成了多个污水湖。原本草绿水清的村庄,如今已被污水弄得满目疮痍,村民生活的村庄已被污水重重包围,土地无法耕种,牲口无法饲养,就连饮用水也已经遭到了污染。(1月10日《中国青年报》)

把污染企业迁往老少边穷地区,是一

种以邻为壑思维。从更广泛的范围来看,本土很多高污染企业是承接自欧美发达国家的污染大转移,而如今又经历着新的转移过程,即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承接沿海发达地区的污染大迁徙。从国内治污力度看,越是老少边穷地区,监管越松。而哪里监管松,高污染企业就往哪里钻。

依照经济学的思维,资本有逐利本性。这些企业治污原本有更彻底、更有效的办法,就是采用新的技术手段,比如利用利权之弊,但引进新技术需要付出较大的成本。污染企业之所以向老少边穷地区悄悄迁徙,核心原因还是那里污染成本低。就是迁,与企业高污染、高耗能紧紧伴随的往往是低利润率和技术含量等问题。但

排污大户们向中西部内迁,并不是因为用工成本提高,而是因为治污成本太高。

这注定是缺德的事,注定是企业缺少社会责任担当的事。一个企业已毁掉了一个地方的青山绿水,犹嫌不足,再去祸害另一片净土,这是真正的害人利己行为。老少边穷地区成新的污染重灾区,对那里的民众生存而言,可谓雪上加霜。因为他们生存原本就处在边缘化的地位,如今家园又被毁掉,这等于是被赶向了一个更不堪的境地。这就形成最坏的一种结局:污染企业减少了自己的成本,与之成反比,贫困中的民众却要为此付出代价,大量增加自己的生活成本。从公权力的操作方式看,它还是另一种形式的“劫贫济富”,给社

会增加更加多的不公正不公平。

可以说,对待环境污染问题,很多地方政府完全是按照惯有的思维定式来考虑。企业纳税之事总是要大于蓝天白云, GDP之事总是要大于青山绿水。对于环保管理往往流于形式,这也造成很多企业有恃无恐:“这个地方不让我排,我换个地方继续排。”反正总能找到排放的地方。消除企业的以邻为壑思维,没有更新的制度设计有效落实,以当下状况来看,是难乎其难。而改变一些地方政府的GDP崇拜倾向,则可能是一件比消除企业以邻为壑思维更为复杂也更为艰难的事情。这似又回到了一个简单的话题上:即以上问题无解,则老少边穷地区环境灾祸难除。 今语